



闲话粮印

□ 潘春华



粮印,又叫“粮封”,俗称“粮印板”,顾名思义,是用于封盖粮仓、粮堆的一种特质的印板,即盖在粮食上面的印章。过去,多用于官仓、粮行、私家贮粮。在粮食进场晾晒、筛选、临时堆放或进仓储存时,于粮食上面密密匝匝地加盖粮印以防偷盗,并作为验信的重要凭证,如同门上的封条一般。

粮印通常由民间木匠用木头制作,从选材、设计,到做坯、雕刻,颇费一番工夫。粮印大多呈长方形,大小不一,常见的长约一尺,宽约半尺,厚约一寸。正面上刻有不同字体、不同风格的文字,字数不等。印文有雕刻家族姓氏的,有雕刻米号、粮行商号的,也有雕刻吉祥文字的,如“福”“德”“仁”“呈祥”“太平”等,还有雕刻成各种吉祥图案、花草纹饰的。印面分朱文和白文两种,朱文印面反写的字是凸起的,按在粮食上正字就凹陷下去了;而白文印面,就是把反写的字镂凹下去,按在粮食上正字就凸起了。一方完整的粮印,除了正面上刻有文字、图饰外,背面还有一个印钮,便于用力按印和将印提起。

盖印时,不需要石灰粉,只需握住印钮,在粮食堆上按一按,拎起粮印后,粮堆上便有了字,接着再盖第二下,第三下,直至粮堆上满是字为止。

粮印,源远流长,它是伴随着农耕文化而生的。宋代受印鉴启发,便开始制作并使用粮印了。不过,那时还是皇粮国库里用,后来慢慢传到民间。为了防止伙计和看守库房的监守自盗,遂用粮印在粮食上面按一按,粮印就是验信的凭证了。

据文献记载,明清时期,官府粮仓囤粮一般用木板隔成方形的粮食囤,民间商号粮仓囤粮则用芦苇席编织成圆形的粮食囤。当每囤粮食装满后,都要由2至3名掌印人在粮食表面压盖刻好的粮印,确认这囤粮食已经封存。掌印人所持的粮印图案各不相同,到了开仓用粮时,盖粮印的掌印人必须同时到场,各自检验所压盖的印模,看看是否完整,以此来确保粮食数量无误。

镇江是江南一带较早使用粮印的城市。镇江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自古以来便是鱼米之乡,重要的运河漕运枢纽和粮食集散地。宋元时期,镇江城内古运河畔黄花亭一带,建有13座大型皇家粮仓,官方在粮食交接、筛选、检验、储存中普遍使用了粮印,作为粮食监管和验信的重要凭证。

镇江开埠后,随着江海大轮开运以及铁路筑成,各地客商纷纷来镇江设立置号,收购转运米麦杂粮,逐渐形成了长江下游规模最大的粮食市场。由此形成了米粮航运业、米粮采运业、粮行业、乡货行业、米店业、磨坊碾米业、堆栈业等米业七大行业,分布于城西江边、平政桥段、中华路及城里南大街、粮米仓、上河沿一带。这些粮行、乡货行、米号、米店,还有堆栈业的粮仓粮库,在粮食筛选、储存、销售中,几乎家家使用粮印,大多用自家商号作为标记。

我国粮印使用最广泛普及的时期,是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土地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近30年时间里。那时,无论生产队还是各大粮食管理站,粮印是必备的监管粮食安全的重要验信工具。

按当时的体制,生产队打下的粮食,先要留足三项:口粮、种子和饲料,剩余的交公粮。在夏收时生产队给社员分小麦,如果当天分不完,进仓的小麦上要盖印。秋收和夏收时一样,如果晾晒不入库,也必须在稻谷、玉米、高粱、小米、豆子等粮食上盖印。夏收秋收将粮食晒干,上缴完公粮,剩下的留着给社员分,粮食入库后同样也会在粮食上盖印。如果要动用,必须由掌管粮印的印管员在场验印。

除去分给社员的口粮外,种子和饲料都要入库保存。那时,生产队的粮库都很简陋,大多是土坯房木头门窗,两把大铁锁把粮库门锁上,一把锁的钥匙由粮食保管员掌握,另一把则由印管员掌管,既没有防盗门也没有报警器,凡是入了库的粮食,都要在粮仓里把粮食打抹平整,再盖上粮印。每次打开粮仓取用粮食时,粮食保管员、盖粮印的印管员、会计或队领导都要到场验证粮印,方可动用库存粮食,以示公正的同时,也体现了乡村朴素的权力制衡理念。有了印记,如果粮食有丢失,一目了然。

掌管粮印的印管员,一般都由村里德高望重、诚实守信且办事认真又有奉献精神的人担任。仓库里,只要动用粮食,无论是晾晒、筛选、加工、分配,也不管冬天、夏天、白天、黑夜,印管员都要随叫随到,十分辛苦。

随着时代的发展,粮印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农耕文化的痕迹,将深深地留存在历史的记忆中。

百年前名流在镇江西郊投资实业

□ 姜平

上世纪20年代,一些知名人士到镇江西郊的高资车站与桥头车站之间投资与创建蚕种制造场,其中包括三益蚕种制造场(以下简称三益,经理冷通);瑞昌蚕种制造场(以下简称瑞昌,经理吴申伯);永泰第一蚕种制造场(以下简称永泰,经理顾衡泉);均益蚕种制造场(以下简称均益,经理冷通等2人)。1949年后,这四个场合并为高资蚕种场,高资蚕种场又由西场(场部)、南场和东场组成。南场为三益和瑞昌所在地;东场为均益所在地;场部为永泰所在地。

无锡薛氏投资的永泰第一蚕种制造场

无锡薛寿萱(清朝外交官薛福成之孙)与妻子荣卓仁于上世纪20年代末在镇江桥头镇投资创建了永泰第一蚕种制造场,后来又在无锡钱桥、荣氏家乡无锡荣巷创建永泰第二、第三蚕种制造场。三场商标均为红永牌。据1937年4月的“江苏建设月刊”刊登的江苏省1936年各蚕种制造场概况一览表,根据其统计数据,位于镇江桥头镇的永泰第一蚕种制造场有蚕室、贮桑室、上簇室等各种建筑,总共有211间房。显微镜13台,桑树田700亩、冷库一座,政府规定生长最大蚁量为6299。在当时江苏省108所蚕种制造场中,规模最大的。永泰场房屋的质量也是最好的,其建筑经过近百年的风吹雨打,并未经任何保护措施,甚至于1937年至1949年处于无人管理

状态,但房屋的框架、红砖墙、黑瓦顶仍完整地保存至今。

中华职教社投资、冷通亲任经理的三益蚕种制造场

根据中华职教社创办的《教育与职业》杂志1933年刊登的三益场概况,它是由中华职教社、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等单位与个人合资,于1929年创建的,注入资本8万元计4000股,属于中华职教社下属单位。当时投资主角及牵头的中华职教社,其创始人及负责人为黄炎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职教社董事会由民国时期一流的实业家、银行家、教育家、外交家等人组成。任三益场经理的冷通,辛亥革命后被孙中山授予中将军衔,1946年任江苏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苏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21年后,冷通回到家乡镇江,集资创办了多项实业,他在投资的众多企业中一般不直接或不单独管理。但他作为三益场唯一的经理,可能直接负责三益场的生产和经营。三益场共有125间房。显微镜4台,桑树田350亩、冷库一座,政府规定生长最大蚁量为2812。1937年11月后停止了生产。抗战胜利后,三益和均益与镇江的几家蚕种制造场合并为四益农场,分别为其三、四分场。这时冷通任四益农场的董事长。目前三益场的房

屋基本上已消失,仅有的一幢蚕室楼也快要倒塌了。

民国名流为镇江留下宝贵的物质与文化遺產

位于桥头镇的三所蚕种制造场都是由冷通选址和代为购置土地的,通过三个场的位置可以推测冷通高尚的人格和对待外地商人的态度。永泰场位于桥头站东侧500米,与京沪铁路平行,距其南侧约200米的山头上,山下是长江冲积平原,水资源丰富,坐火车方便。三益场位于永泰场南侧约1000米,其场位于板凳山山上,丘陵腹地,与永泰场相比,距桥头火车站远一些,水资源差一些。瑞昌蚕种制造场位于三益场的南面,两场以一墙相隔。从上述位置可以看出,不论是交通和取水,永泰远好于三益。而瑞昌位于三益的南面,光线比三益更优一些。虽然各场的场址都是由冷通确定的,但他将最好的给了永泰,也将光线好的南面给了瑞昌,自己选了相对比较差的。他先人后己的品质,为外地的投资者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进入21世纪的今天,各分场地理位置好与差也发生了逆转,如现在由政府集中供水,水源不再是问题,桥头站不再客运,312国道的建设及其快速化改造等,显得三益场所在的位置更优一些。

薛寿萱从1925年起就关注镇江的蚕桑建设,在镇江蚕种制造场建设前,永泰与上海瑞纶丝厂(经理吴申伯)捐助资金万两,建造阿莫

尼亚冷库一座,开创中国冷库建设的先河。投入生产后,他们毅然担任了镇江场制种部的一切日常工作。到了1929年,薛寿萱、吴申伯不再单纯的捐助而是投资,而分别在桥头镇创建了永泰和瑞昌场。可见无锡人薛寿萱和吴申伯对全面抗战之前的镇江蚕桑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冷通积极支持本地建设,通过自己的人脉,让远在上海的中华职教社来镇江投资,中华职教社下设11个附属单位,8个位于上海,镇江就占2个。时任的中华职教社董事是由蒋梦麟、沈恩孚、袁希涛、穆湘玥、荣德生、钱永铭、陈光甫、江恒源等人参与,他们很可能是三益场的股东,因此说高资蚕种场是由民国一批上层名流所投资的一点不为过。三益场贯彻黄炎培教学理念,提倡女子职业教育,改进农村妇女生活,改变学员教学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员通过半工半读,自力更生地学到一技之长,“半工”所得的收入,在支付上学费用之后,还能资助家用。同时将教学的严谨引入到生产之中,用科学方法改良蚕桑,制造蚕种,其生产的蚕种在江浙两省蚕业界很有信用。同时冷通注重多种经营,试种果树,试养羊兔,实施成人教育,提高附近农民的致富能力。可见高资蚕种场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历史渊源,是我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职业教育探索的一个缩影,对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插队时与生产队群众合影 后排左2为作者



插队时与生产队群众合影 后排右4为作者

回忆年少插队的日子

□ 刘卫华



红卫兵队欢送新兵入伍合影 前排右3为作者

艰苦,但初来时的新鲜感冲淡了这一切。

插队时的主要农活是挑粪、插秧、收稻、堆肥。这些,我都经历并很快成了熟手。

第一道难关是挑粪,城里长大的孩子肩膀嫩,两天下来,双肩肩头皮都磨破了,垫上毛巾,接着挑。慢慢地,挑着粪桶行走自如,也学会了行进间的左右肩互换。从村里一家一户的粪缸到生产队的大田,路途有八里地之遥,中间只歇一次,也没觉得多累。

关于挑粪,我有过几个趣事。一个是过田埂下坡时,后桶撞在田埂上整个倾覆,粪水顷刻间洒满全身。记得当时父亲正好从城里下乡来看我,我和他打了个招呼,便跳入知青团前面的小河中洗澡。父亲在河边默默地望着我,那一刻我的心情至今我仍能想见,酸楚而又爱怜。还有挑粪大多是一大早,来不及准备早饭。每次我都是花两毛钱在镇供销社买一块五仁月饼,边挑着粪担边啃着月饼,这也是至今我对五仁月饼情有独钟的原因。

第二道难关是插秧。炎炎烈日下,弯腰在稻田里插秧是一个既辛苦又有技术要求的农活。背上,烈日烘烤,红了一片;脚下,深一脚浅一脚,稍不留神就会跌倒;手上,既要用力均匀,又要横竖对齐,确保好看又能成活。最难对付的是水中的蚂蟥,膝盖以下爬了一片。收工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盐涂抹,让其从肉中自行退出。

第三个难关是收稻。镰刀要正好挥到稻秆底部,齐刷刷成片割下。时间久了,手上便

磨出血泡,而且稍不留神便会割破腿脚。而收割完后的捆扎起运,要求也高,不仅要捆扎紧,而且要捆得多。记得有一次捆扎时,稻秆中突然蹿出一条蛇。对自小怕蛇的我来说,当时吓得我魂都没了,一身冷汗。

过了农活关后,也就适应了下放的生活。与村里的年轻人一样,我也成了大劳动力,与他们挣一样的工分。第一年年底分红结算时,我拿到了近200块的工分奖励。这是我的第一笔劳动所得,喜悦之情不言而喻。

插队生活艰苦而又快乐。插队第二年,我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有了这个头衔后,我组织开展了很多适宜年轻人参加的活动。一次,生产队边上的船闸需要清运淤泥,我们组织青年突击队揽下了这活,奋战了五天,挣到了几百元的第一笔支部活动经费。我们用这笔钱购买了几百册图书,在知青点开办了图书室。团支部还成立了篮球队,一有时间就组织训练,隔三岔五地与兄弟大队、周边厂矿企业开展比赛。在镇上组织的文艺汇演上,团支部的三句半等节目都拿到了奖项。记得那时的团课和支部学习活动也是定期开展,年轻人相聚在一起,活力四射,笑声飞扬。团支部还有一个诗词创作组,不少小诗人会即兴朗诵自己的新诗,引来掌声一片。那是一段属于年轻人的日子,那是一段青春似火、朝阳相伴的岁月。

1976年夏天,全国在抗震。我们知青点的知青和大队青年一起在篮球场上搭建了两个大棚,男女青年各占一个。夜幕降临,周遭一片寂静。而大棚中却非常热闹:有人说起了扬州评话,有人讲起了《一双绣花鞋》的故事,有人吹起了口琴。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冬天。镇上来了征兵部队的官兵,是海军上海基地的部队。当海



参加镇江市上山下乡宣传团时合影 后排右2为作者



参加镇江市上山下乡宣传团时合影 前排右3为作者

军,一直是我的梦想,我在第一时间报了名。体检、政审、家访,一路绿灯。这年,我所在的镇镇有三十多个年轻人应征入伍到同一个部队。为此,镇里专门在纸浆厂大礼堂召开了应征入伍欢送大会。作为发言代表,我坐在了主席台上。席间,坐在我边上的一位镇领导轻轻对我说:“小刘,其实依你的表现和潜质,不去当兵在地方可能会发展得更好的。”我微微一笑,答道:“谢谢书记的鼓励。”其实我知道,那时镇党委已确定发展我为党员并已发出了外调函。但当兵是我从小的梦想,心早已飞到了军营。多年以后,每每想到他的话,心里总是感到十分的欣慰。我在两年不到的插队生活中,磨炼了坚强的意志,培养了坚韧的精神,提升了综合能力,体验了农村的生活,也得到了领导的认可。于我而言,这是一笔莫大的无形资产,是个人顺利成长进步的最扎实的基础。难忘那插队的岁月,感恩那段经历赋予我的前进动力和进取之心。

